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香港的城市生活模式：  
深水埗社區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2012年2月

# 摘要

## 1. 前言

本研究計劃承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托，旨在回應公眾對深水埗區的社會經濟及城市老化問題的關注。一直以來，我們沒有持續的關於深水埗的城市生活的研究。直至 2000 年代中期，才有少量的相關研究。同時，社會大眾普遍將深水埗定型為一個衰落和無望的社區。

在現有的研究的基礎下，本研究計劃旨在提出對深水埗社區生活和區內的社經問題提出嶄新的理解和有系統的分析，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區內的居民生活和問題既複雜又多樣。社會和經濟生態與政治和地理環境緊扣在一起。因此，本研究計劃採用綜合性的研究方法，結合政治學、地理學、社會工作學、建築學和文化研究等學科來探討深水埗的城市生活。

## 2. 研究謎團

深水埗是香港其中一個老區。與其他老區一樣，深水埗面對城市老化的問題。深水埗更有多樣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2008 年深水埗的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13,800 元）是全港各區最低的（18,000 元）(Census and Statistical Department, 2008)。同樣，深水埗的勞動市場參與率（56.3%）也是全港各區中最低的。深水埗居民不少是低收入、失業人士、新移民和長者。就以上特點而言，深水埗的生活質素理應不

高。然而，本研究發現，深水埗居民的生活滿意度（0.2075；-2 分爲最差，2 分爲最高）卻不比全港的平均數值相差很遠（0.2461）。它與從客觀數據所得的設想之間的差異是值得研究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對深水埗居民的生活、提升他們生活滿意度的方法有更明確的了解。這正是貫穿本研究報告的主題。

### **3. 研究目標**

本研究有以下目標：

- 3.1 對深水埗的生活素質作全面的探討，及呈現各社會經濟群體的生活素質。透過探討影響深水埗生活素質的因素，從而對深水埗的城市生活作全面的理解。
- 3.2 追溯深水埗城市生活的背景和歷史脈絡，特別是探討區內貧窮和社會排斥的狀況，廓清弱勢社群的困境。
- 3.3 研究居民、民間組織之間的社會資本，探討能否透過促進區內社會信任、互助來處理貧窮和社會排斥問題。
- 3.4 探討政府機構如民政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市區重建局和區議會推動區內社會資產的工作和成效。
- 3.5 評估民間組織如社區組織、社福機構、倡議組織和政黨促進社會資本、利益整合、處理糾紛和／或社區動員的角色。

3.6 量度深水埗居民的公民參與度。本研究探討影響社會及政治參與的因素、公民參與對社區運作和個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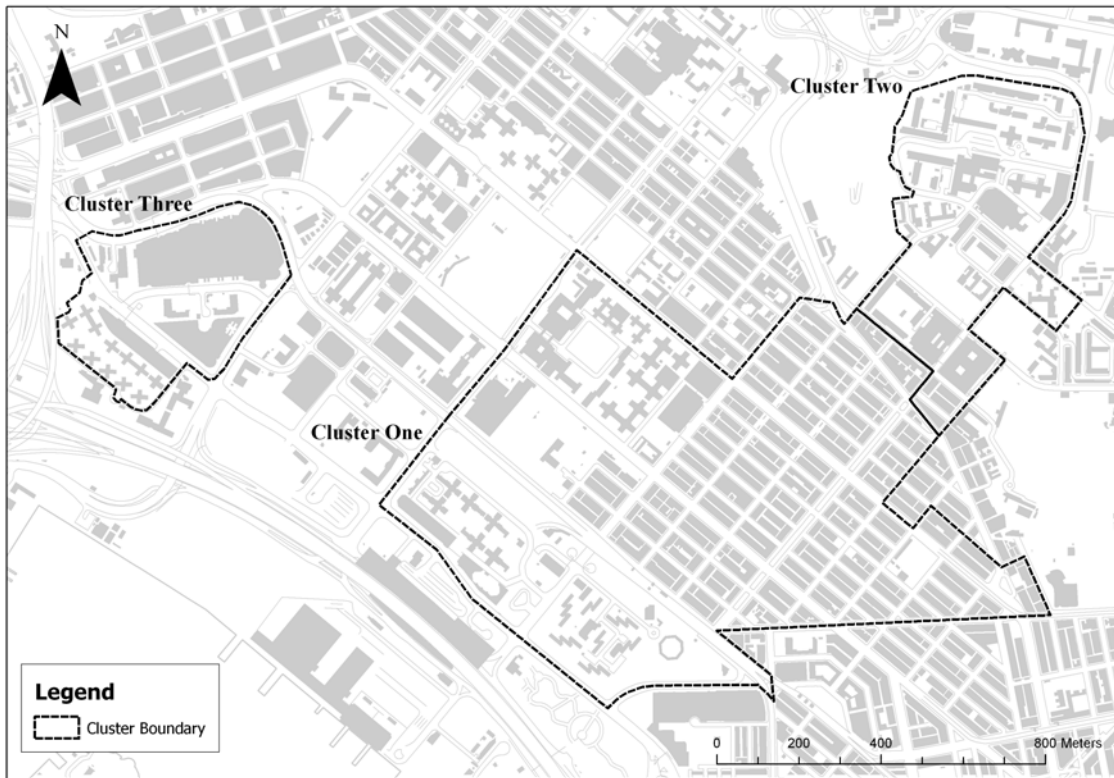
3.7 探討深水埗不同社群（不同住屋類型和地理區域的居民）之間的關係。透過嚴謹的研究分析，探討深水埗區內是否存有社會分化的問題、社會分化如何影響社區身份、公民參與和互助。

3.8 探討及解釋深水埗的空間和居民生活形態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旨在提出區內居民如何與他們居住的地方建立關係及其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透過對生活滿意度、社會資本、民間組織、政府機構、社會分化和土地使用的分析，本研究旨在全面地勾劃深水埗的城市生活。它或可為各公共政策包括房屋、城市更新、社會福利、民政事務等提供參與指引。

####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其中一個研究重點是探討不同住屋類型的居民之間的差異、居民對地方的理解和它們對生活滿意度、社會資本和公民參與的影響。如果將整個深水埗區作抽樣分析，大部份研究樣本將會來自佔區內人口大多數的公屋居民，並過份集在一個住屋類型（公屋），這不符合本研究計劃的上述重點。因此，我們劃分了三個研究區域，各區域具有不同的住屋類型、社經背景、在地理位置上與深水埗中部有不同的關係（圖一）。不同地區的差異使我們能探討住屋類型、地理位置對城市生活形態的影響。



圖一 三個研究區域

三個研究區域的特點:

- 4.1 區域一: 以長沙灣道、南昌街、深旺道、東京街為界。這區域包括了深水埗中部和西九龍走廊的填海區。它代表了深水埗的商業中心。它包括了兩大種住屋類型：一是戰前和戰後所建的「唐樓」；二是建於 1980 至 2000 年代的公共屋村，即在深水埗中心的麗閣村和麗安村，及沿西九龍走廊的南昌村和富昌村。
- 4.2 區域二：以南昌街、石硤尾山坡為界。這地區包含兩個公共屋村，即白田村和石硤尾村。前者建於 1975 年，是深水埗現存最舊的公共屋村。它也是區內最

大和居住人口最多的公共屋村，有 8,400 個住戶，居住人口約為 24,200 人。石硤尾村建於 1976 年，接近深水埗中部。它建有早期的長型設計的公屋，設有開放式公共空間、街市和其他康樂設施。

- 4.3 區域三：處於葵涌道和西九龍公路、長沙灣道和美孚之間。它是深水埗最新發展的地區。它包含兩種住屋類型。一是四個私人發展中產屋苑，即泓景臺、昇悅居、宇晴軒及碧海藍天，又稱「四小龍」；二是建於 2004 年的海麗村，它是深水埗區內其中一個新建的公共屋村。這地區頗遠離深水埗中心舊區。

本研究採用四種資料搜集方法：

- 4.4 第一，我們分析與深水埗相關的現有統計數據，包括 2001 年人口普查及 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統計中的相關數據，以及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以對深水埗的社會及經濟特徵，特別是該區居民目前所面對的困境，有基本的了解。
- 4.5 第二，我們透過分析圖像資料，例如拍攝深水埗地貌特徵的航空圖片，追溯深水埗在上世紀的地理變化，例如填海、土地使用、城市規劃，並分析這些變化與該區目前所面對的困境之間的關連。

- 4.6 第三，我們在上述三個區域進行問卷調查，以取得第一手資料，以了解深水埗居民的社會資本、公共參與、對地方的理解、社會分化以及生活滿意度。這些資料，在現有的研究中並沒有系統而嚴謹地收集和分析。
- 4.7 第四，我們向深水埗居民進行深入的訪談。是次研究採用了兩種訪問，一方面，我們訪問了社會領袖，包括政府官員、區議員和非政府組織領袖；另一方面，我們與一般居民進行了聚焦小組訪談。結合這兩種訪談，讓我們得到全面的研究資料。此外，地區居民的經驗，能夠補充統計數據，讓我們對人們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
- 4.8 是次研究的目標對象，是居住在該區公共房屋、私人屋苑或「唐樓」的成年人。60 歲或以上的長者亦包括在研究內，因為他們佔深水埗區人口相當的部分，如要了解深水埗區生活的整體面貌，就不能夠將他們排拒在外。
- 4.9 我們採取了隨機抽樣方式，抽取了上述三個區域的地址。為了統計分析的需要，我們把目標定在至少 1,000 個成功樣本，每區域約 333 個。同時，由於社會分化是研究焦點之一，並考慮到接觸私人住宅居民的困難，我們設定每種房屋類型最少要有 150 個成功樣本。
- 4.10 在三個地區隨機抽取地址的同時，我們還採用基什網絡（Kish Grid）方法，從每個住戶中抽選一個合資格的人士作為受訪者，由受訓過的調查員進行調查。

4.11 問卷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執行。是次研究的調查，主要由研究所招募、訓練和管理的學生助理進行。調查由 2010 年 7 月開始，至 2011 年 4 月完成，共成功進行了 1,114 個面談訪問。第一區域、第二區域及第三區域的回應率分別是 47.41%、46.27% 及 38.08%。

4.12 我們共進行了 25 位社區領袖訪談，以及 16 個聚焦小組訪談。受訪者包括有：

- (1) 與地區管治密切相關的政府官員；
- (2) 區議員；
- (3) 公民協會的社會領袖；
- 以及 (4) 深水埗一般居民。

為符合研究焦點，受訪者需盡量來自不同的社經背景，包括住房屋的類型、地理區域、年齡組別、性別、工作狀況、出生地點及種族。

## 5. 問卷樣本的特徵

以下簡述我們的樣本特徵：

5.1 在問卷調查中，共完成了 1,114 個樣本，並經驗證為有效。當中，有 495 個樣本（44.4%）在第一區進行，340 個樣本（30.5%）在第二區，279 個（25%）在第三區。

5.2 住房類型方面，有 58.8% 的受訪者來自公共房屋，29% 來自私人屋苑（「四小龍」及居者有其屋計劃），12.2% 是唐樓（即板間房、唐樓單位及套房）住客。



- 5.3 在 1,114 個成功受訪者中，59.2% 為女性，40.8% 為男性；在年齡分布上，14% 樣本介乎 18-29 歲，56.5% 介乎 30-59 歲，29.2% 為 60 或以上。此外，有 41.1% 的樣本是在香港出生。換言之，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是移民，當中有 81.6% 居港超過 7 年，有 94.6% 在移居香港前生活於內地／澳門／台灣。
- 5.4 教育程度方面，32% 的受訪者是「無正式教育／幼稚園／小學」，48.8% 取得「中學」程度，有 18.8% 取得「專上」程度。
- 5.5 樣本之中，有 50.2% 受訪者有受薪工作，49.7% 沒有受薪工作。有受薪工作的受訪者中，77% 是全職工作，22.6% 是兼職，其餘 0.4% 在全職工作以外同時亦有兼職。
- 5.6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息方面，19.7% 受訪者家庭收入少於 6,000 元，只有 7.6% 收入在 40,000 元或以上。大多數受訪者的家庭收入介乎兩者之間。具體而言，26.7% 每月家庭收入介乎 6,000 元至 14,999 元，21% 每月家庭收入介乎 15,000 元至 39,999 元。

## 6. 從現有數據分析的主要研究發現

透過分析 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以及廣泛的圖像資料，我們發現了一些地理及社會經濟的特徵、趨勢，以及他們為深水埗帶來的挑戰。

- 6.1 深水埗中部以唐樓密集見稱，其發展可上溯至 1920 年代，但今天保存下來的大部分唐樓，是建於 1940 及 1950 年代。二次大戰後，深水埗吸引了大量跨境難民遷入，結果，區內的戰前唐樓拆卸，重建為五至六層高的唐樓。
- 6.2 深水埗最大的變化發生於 1950 至 1970 年代。由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帶動，許多變化都出現於深水埗中部以外的地區，例如長沙灣和石硤尾。變化包括：興建道路、工廠大廈（如長沙灣工廠大廈）、公共設施、休憩用地和公共房屋（如蘇屋邨、石硤尾邨和白田邨）。於是，深水埗成為了香港其中一個工業及居住中心。
- 6.3 隨著經濟全球化及中國走向開放，香港大部分工業已被遷移。因此，1980 和 1990 年代，石硤尾及長沙灣的工廠紛紛關閉。石硤尾工業大廈於 2008 年改造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長沙灣的工業大廈所在地，已於 2002 年清理，現將重新發展為公共屋邨。
- 6.4 1990 年後，深水埗的轉變仍持續。這段期間的主要發展，包括進一步的填海，以及西九龍公路竣工（1997）。在填海土地上，興建了兩個公共屋邨：富昌（2001）和海麗邨（2004），這兩個屋邨均遠離深水埗中部。此外，四個大型私人屋苑（被稱為「四小龍」）的興建，令大量中產居民遷入此區。
- 6.5 深水埗的發展可追溯至 1920 年代，而最大的轉變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發生，該區面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建築物的老化。重建計劃已在公共屋邨展開。

對公共機構而言，更大的挑戰來自唐樓，裏面居住了大量不同背景的低收入居民，他們沒有能力負擔私人樓宇或居者有其屋，因此，大規模的拆卸並不現實。

6.6 基於市區老化問題，深水埗被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協會列為市區重建的關鍵地區，舊樓往往被四、五十層高、建在大型商場上的豪華住宅取代，公共屋邨亦進行重建。重建計劃令這區的地理和社會構成重新組合，新居民遷入，同時有相當部分的舊居民遷出。這對原有社區存在已久、植根於城市肌理和公共記憶的社會網絡，可能導致負面影響。深水埗更新的同時，如何令它的歷史、身份及社區免於消亡，將是未來數十年的一大挑戰。

6.7 市區重建除了令社會網絡與社區身份備受挑戰，還帶來貴族化的問題。換言之，新發展的豪華屋苑，尤其是所謂的「四小龍」的興建，吸引了富裕人士遷入，可能導致經濟條件較遜的居民間接被迫遷離。

6.8 新發展的豪華住宅在深水埗周邊出現，對區內居住於不同區域的居民，很容易造成社會和空間的分隔。平心而論，社會和空間的分隔在四小龍出現前也許已經存在。傳統上，中產住宅區（如又一村和美孚新邨）與較基層的地區（如深水埗中部和公共屋邨）之間，一直少有聯繫和交往。然而，周邊新發展中產屋苑的出現（如碧海藍天和泓景臺），似乎加深了分隔的問題。部分原因來自土地運用的設計：填海地區的公路，每邊有三條行車線，很容易就

把新建的屋苑和靠近深水埗中部的海麗邨分隔開來。另一個原因是房屋類型的差異，導致不同的生活方式、需求和身份。於是，「四小龍」的住客，傾向跟公共屋邨和唐樓的住客保持距離。

6.9 隨著市區老化和去工業化，過去十年深水埗被一連串的社會經濟問題所困擾。例如，與其他十七區比較，在家庭每月收入上，深水埗在 2000 至 2010 年一直是最全香港最貧窮的地區，

6.10 深水埗區亦面對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深水埗的老年人口（65 歲或以上）比率是香港其中最的一個，過去十年，比率一直維持在 16% 左，香港整體平均則只有 12%。

6.11 深水埗的勞動人口參與率（2010 年為 59.7%）顯著低於全港平均（2010 年為 55%），這顯示區內無法被就業市場吸納的勞動人口，比例高於其他地區。在這方面，從 2003 至 2010 年，深水埗再次成為全香港最差或第二差的地區。

6.12 與低勞動參與率息息相關的，是深水埗居民偏低的教育程度，它一直是全港最低的區域之一。以統計數字說明，2010 年，有 75% 的深水埗居民達至中學程度，而全香港的同期平均數字是 77.7%。但需要注意的是，從 2009 至 2010 年，深水埗居民具有中學程度的比例有所增加，這可能是由於有中產人士遷入了區內新發展的私人屋苑所致。

6.13 深水埗其中一個特徵是集中了大量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佔全區人口的 5.7%，明顯高於全港的平均 3.2%。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1 和 2006 年，從內地新來港的移民當中，有 9% 集中居住於深水埗。

## 7. 問卷調查和訪談的主要研究發現

在各客觀數據來看，深水埗居民對他們的生活水平理應感到困擾。但是，我們的問卷調查和其他研究單位所作的類似研究均顯示，深水埗居民的生活滿意度頗高。透過運用不同視角和理論概念，本研究旨在對深水埗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和深水埗城市生活形態作全面的分析。

### 7.1 社會資本

7.1.1 研究發現，社交網絡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來解釋深水埗居民對他們的社區生活的理解。我們的問卷調查受訪者均被問及他們在區內的朋友數目以及他們對生活素質的自我評分。結果得出兩者之間在統計學上之間有緊密的關係（ $P < 0.05$ ）。整體而言，擁有越廣闊的社交網絡的受訪者，他們的生活素質越高。然而，在區內沒有朋友的受訪者的生活質素卻不低。這可以運用「地方」這概念分析。

7.1.2 社交網絡如何影響生活素質是容易理解的。社交網絡或能對那些處於煩憂的人提供情緒支援、促進信念和信任。因此，團結式社交網絡未必不比橋接式社交網絡優勝。同質的社交網絡可促進互信。

7.1.3 除了情緒支援，社交網絡也可拉近志趣相投的人。也就是說，它可以建立康樂群體，人們可從中得到快樂。

7.1.4 深水埗有著各樣的社經問題。橋接式社交網絡對提升深水埗居民生活素質同樣重要。本研究包括探討受訪者的橋接式社交網絡（受訪者是否能夠得到經濟支援）與他們對生活素質的自我評估的關係。整體來說，能得到「很多朋友」的經濟支援的受訪者，相對於那些「沒有朋友」或「很少朋友」能提供經濟支持的受訪者，對生活狀況持有較正面的看法。

7.1.5 問卷調查證實了社會融合和生活素質的關係。問卷受訪者均被問及他們對深水埗區的各社區關係（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年齡層之間、新移民與本地居民之間、不同種族之間）的評估。我們將受訪者就各社區關係的評估組合成一個單一的指標，即受訪者對區內的「陌生人」的整體態度。結果發現，受訪者對區內的「陌生人」的整體態度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在統計學上有緊密的關係（ $p < 0.05$ ）。整體而言，受訪者對社區關係的滿意度越高，他們的生活素質則越高。

7.1.6 基於社會資本這概念對研究重要啓示，探討深水埗的社會資本顯得十分重要。一直以來，深水埗被視為有濃厚人情味的社區。然而，我們的質性和量化分析均否定了這看法。例如，多於一半的受訪者（51.8%）表示在香港他們

「沒有」或「很少」朋友。相反，只有極少數的受訪者（7.1%）表示他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這些數據顯示深水埗居民的社交網絡很薄弱。

7.1.7 受訪者在深水埗內的社交網絡同樣是十分薄弱。多於 60.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區內「沒有」或「很少」朋友。相反，只有 5.4%受訪者指他們在區內有「很多」朋友。

7.1.8 現有的社交網絡的緊密程度也不樂觀。有 92.7%及 78.9%受訪者分別表示他們對家人和親戚非常信任。然而，只有 55.3%及 49%的受訪者分別表示他們對朋友和鄰居存有信任。對朋友缺乏信任可能使減低居民遇到困難時尋求朋友陪伴和協助的意慾，這也阻礙了他們從朋輩關係得到安慰和安全感。

7.1.9 我們的問卷調查也發現受訪者一般不願意尋找朋友和鄰居的陪伴。只有 36.8%和 8.8%的受訪者分別表示他們「有時」或「經常」與朋友出外消遣。大部份受訪者（65.5%及 42.6%）分別表示他們「有時」或「經常」與家人和親戚出外消遣。

7.1.10 薄弱的社交網絡除了在缺乏信任和疏離的社交接觸體現外，也體現在人們尋求協助的困難。只有 35.1%的受訪者表示當他們沒空處理日常生活的事時能找到別人的幫助。當中，大部份受訪者傾向尋求家人（18%）和親戚(6.4%)的協助。只有 10.1%及 6.9%的受訪者分別表示他們能找到朋友和鄰居的幫忙。

7.1.11 同樣，深水埗居民在遇到重大事情時（如經濟方面有需要）難以找到協助。

只有 27.7%的受訪者在這情況下能找到他人的幫助。當中，大部份的受訪者會尋求家人（18.3%）和親戚（7.4%）的幫忙。相反，只有 9.8%及 1.3%的受訪者表示有朋友和鄰居能協助他們。

7.1.12 深水埗居民難以尋求社會支援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的社交網絡相當同質。問卷調查受訪者均被問及他們的朋友有否來自與他們不同的社經階級。在區內有朋友的受訪者中，近一半（40.6%）表示他們所有的朋友均是來自與他們相近的社經背景。

7.1.13 幸而，深水埗的整體社區凝聚力是不俗的。大部份受訪居民認為不同階層、年齡組別、種族及出生地的人都能在區內融洽友善地共處。但由於不少受訪者表示未必給予肯定的答案，所以我們要小心看待這調查結果。

7.1.14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我們歸納幾個處於危機的群組。第一是新移民。相比本地出生的居民及已得到永久居留權的移民，新移民的社交網絡是最狹窄的。第二是低收入家庭（每月家庭收入少於 6,000 元）。儘管他們不是社交網絡最差的一群，但他們對朋友的信任度是各家庭收入組別中最低。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面對眾多社經困難，因而他們需要他人的物質及非物質的支援。但是，在區內他們正正卻是擁有最低社會資本的一群。



7.1.15 第三個危機組群是唐樓居民。首先，不少唐樓居民是新移民，他們到港後最難適應的往往正是香港的新環境。另外，唐樓居民的教育程度大多是很低，他們又不少是失業人士和低收入人士。唐樓居民既面對眾多社經問題，社會資本對他們尤為重要。可是他們是缺乏社交網絡的一群。

7.1.16 要提升深水埗區的社會資本以至生活素質，我們必先理解區內社會資本貧乏的成因。首先，我們就居民參與民間組織的程度、民間組織的類別與貧乏的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研究卻發現，參與民間組織的程度和民間組織的類別、以及參與民間組織的程度和社交網絡、互惠和信任皆沒有統計學上的關係。

7.1.17 個別訪談的資料分析發現，（薄弱的）社交網絡和互惠與民間組織的組織結構有關。在深水埗區內運作的民間組織與他們的成員往往存有家長式關係。這種關係反映了組織的層級結構。結果，組織成員、支持者和受惠者傾向依賴組織領袖。他們不傾向與其他成員和受惠者建立橫行的網絡關係，組織活動結束後也就不會尋求其他成員和受惠者的協助。

7.1.18 另外，民間組織之間的資訊、人力和組織資源的交換網絡也很薄弱。雖然受訪的組織領袖不斷提及組織間的緊密聯繫，但他們就組織的外部聯繫的說法並不吻合。他們一方面強調與其他組織建立橫行聯繫的重要性（如發展全面

方案處理深水埗居民的社經問題），但另一方面他們強調不同組織的分工的重要性。

7.1.19 如上所述，建立橋接式社交網絡對提升人們的生活素質非常重要。人們參與不同的民間組織因而是重要的。雖然人們未必信任「陌生人」，但我們的受訪者頗信任民間組織（54.6%）。因而，民間組織之間的協作可以充當一個平台，讓成員建立橋接式社交網絡。但是，上述的民間組織分散狀況窒礙了它們擔當建立橋接式社交網絡的角色。

7.1.20 民間組織間的不連結狀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之間的價值觀與信念的差異。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價值觀與信念，令它們對組織具體運作和區內的問題有不同的理解。這對它們選擇與那些組織接觸合作有決定性影響。

7.1.21 另外，民間組織缺乏經濟和人力資源，使它們不著重建立跨組織關係。不少受訪組織領袖知悉跨組織網絡的重要性。但同時他們指出，建立這類聯繫對本來已緊拙的的經濟和人力資源造成很大壓力。而且，投放在建立跨組織網絡的努力，最終的結果往往又不可預知。

7.1.22 政府的資源分配方式也影響民間組織建立跨組織網絡的意慾和力度。現時政府資源往往投入於個別的目標社群。於是，社會福利組織和社區團體也就機械式地劃分了他們的服務對象。與此相關的是現行的市場化、著重競爭的資

源分配方式。競爭窒礙組織間建立協作、團結和相互關係，以至本地居民間的橋接式社會資本。

## 7.2 社會及政治參與

7.2.1 公民參與對社區運作和建立充權意識擔當重要角色。然而，整體而言，深水埗區居民的社會及政治參與度很低。在本研究計劃裡，社會及政治參與度是指市民參與社區事務和政治活動的程度。社會事務和政治活動包括影響政府決定的集體行動，或市民就改善生活和其他他們所關注的議題的直接參與行為。

7.2.2 就制度外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而言，我們的問卷調查發現簽名運動是最多人參與的活動，這是由於它涉及的參與成本較低。然而，只有 31.2%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有參與簽名運動，68.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

7.2.3 同時，制度內的社會和政治參與也很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深水埗居民參與地區組織會議（如互委會會議、街坊福利會會議）的程度不高。約 92%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沒有參與過這類活動。只有 3.7%受訪者表示有參與這類活動，當中只有 0.7%受訪者表示經常參與。

7.2.4 同樣，約 96%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從沒出席政府的地區諮詢活動。只有 1.5%受訪者表示「間中」或「經常」參與。另外，97.9%及 39.9%的受訪者表

示他們在過去一年從沒約見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普遍的低社會及政治參與度顯示這與個別組織的興衰表現沒太大關係。

7.2.5 相對香港整體而言，深水埗區社會和政治參與就顯得特別低。例如在建制外參與方面，10%香港市民曾參與示威遊行，但我們的調查則發現只有 5.7%的受訪者曾參與這類活動。建制內參與方面，約有 10%的香港市民曾向立法會議員求助及反映意見。但我們的調查則發現只有 2.1%的受訪者曾接觸立法會議員。

7.2.6 雖然科技進步促進了政府電子服務的發展，深水埗居民的政府電子服務使用率無論在絕對數據上和比較數據上也很低。我們的調查發現只有 31.4%的受訪者曾透過政府網頁搜查資訊，2009 年的住戶調查則有 58%的香港市民透過政府網頁獲得資訊。此外，我們的調查發現只有 22.2%的受訪者曾使用政府的網上服務，2009 年的住戶調查則有 50.1%的香港市民曾使用此類服務。我們的調查也發現只有 3.1%的受訪者透過政府網頁提交意見或投訴。

7.2.7 問卷調查受訪者民已登記為選民的比率（約 46%）也比整體的已登記選民比率低（約 60%）。但他們在 2007 區議會投票比率（56%）卻比整體投票率高（38.83%）。高的投票率可能是低選民登記率所致。可見，已登記為選民的人可能較願意和有決心投票。

7.2.8 信任可以是提升社會及政治參與度的重要因素。如人們相信政府或組織能嚴正回應他們的訴求和關注，他們更願意參與政公共事務。除了民間組織，問卷調查受訪者對以下組織的信任度依次為特區政府（47.8%）、立法會（33%）及區議會（34.9%）。受訪者最不信任政黨。以上數據顯示區內沒有任何組織能大規模整合和動員居民。

7.2.9 特區政府同時是受訪者最信任和最不信任的組織。它能成為受訪者最信任的組織可能是因為它是最有權力的組織。但對於曾與政府接觸的受訪者，他們的實際經驗不符合期望，這可能是政府成為受訪者最不信任的組織的原因。這原因與一些聚焦小組受訪者的分享吻合。對政府不信任或會減低市民向政府官員求助和反映意見的意慾。

7.2.10 不同社經背景的人之間的公共事務參與度在也有不同。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出生地是影響市民的公共事務參與度的重要因素。越高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本地出生的受訪者的社會及政治參與度傾向較高，這反映了他們的充權意識和身份認同感較高。

### **7.3 深水埗區內社會分化**

7.3.1 以上提出了深水埗區薄弱的社會資本和公民參與一方面是由於組織（民間組織、政府機構、政黨、區議會及立法會）與社會缺乏聯繫，另一方面是由於組織之間缺乏聯繫。我們的質性和量化研究分析更顯示有數個結構性因素導致

深水埗區內出現分化甚至衝突。這些因素包括社會經濟變項和住屋類型，它們對社會資本、公民參與和社會衝突有所影響。

7.3.2 如上所述，問卷調查受訪者均被問及他們在香港以及深水埗區內有多少朋友。唐樓居民和公屋居民的全港的社交網絡範圍與私人屋苑的居民相約。但唐樓居民和公屋居民的深水埗區內的社交網絡則比私人屋苑的緊密。也就是說，深水埗區內新興的中產階層就如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他們並未融合在深水埗社區內。

7.3.3 整體而言，深水埗區的社會參與度很低。然而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來自不同的住屋類型的受訪者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參與。私人屋苑住戶比公屋和唐樓居民較多參與民間組織。有 14%的來自私人屋苑的受訪者擁有團體成員身份，只有 8.8%的來自公屋和 6.9%來自唐樓的受訪者是組織成員。

7.3.4 整體而言，深水埗區的政治參與度很低。然而，來自不同的社經背景的受訪者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參與度。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有較高的政治參與度。在港未住滿七年的新移民的政治參與度則很低。

7.3.5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政治參與度與對政府的信任度相關。對政府越不信任的受訪者，他們的政治參與度則越高。

7.3.6 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和住屋類型是影響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的要素。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越高的受訪者，他們對政府信任度傾向較低。然而，雖然唐

樓居民的教育和收入水平較低，但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度相對於其他住屋類型的居民是最低的。這反映了社經背景和住屋類型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形成區內不同的城市生活模式。

7.3.7 雖然唐樓居民傾向不信任政府，但是他們不熱衷參與政治事務。可行的解釋是他們的政治效能意識較弱。在聚焦小組訪談中，受訪的唐樓居民均不相信他們有能力改變生活處境。他們亦不認為政府會照顧他們的需要。他們別無他法，唯有接受現狀。

7.3.8 問卷調查受訪者對深水埗社區認同感頗高。近半數表示他們對深水埗區有中等的歸屬感，另有三分一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社區有很強的歸屬感。問卷調查數據分析也顯示社區認同和生活素質在統計學上有緊密關係。社區認同感越低，生活素質也較低。

7.3.9 深水埗區居民的社區認同感頗強。要指出的是，不同社經社群和住屋類型居民對「社區」有不同的理解。

## **7.4 地方與城市生活**

深水埗區內的地方空間與居民的城市生活模式有緊密的關係。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7.4.1 深水埗居民透過區內的地方，特別是市中心的市集，得到生活滿足感。因為這些地方為居民提供低廉和便捷的生活。

- 7.4.2 基層市民往往較依賴市中心的市集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包括購買日用品、消遣。
- 7.4.3 因此，居於深水埗周邊地帶的基層市民，特別對住屋地點連接市中心交通配套不足尤感不滿。
- 7.4.4 唐樓居民尤不滿深水埗的社區環境。但同時多種原因，包括低廉的物價、便捷的交通，令他們繼續居於深水埗。
- 7.4.5 由於深水埗居民依賴尋常、具有民間特色的地方滿足生活需要，因此他們傾向認為一些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為深水埗的地標。

## **8. 結論及建議**

### **8.1 薄弱的社會資本**

- 8.1.1 深水埗的社會資本和民間團體角色比預期的薄弱。區內居民組成的重構，再加上新移民及新中產階層的遷入，破壞了原有的鄰睦關係。深水埗的社會構成沒有如預期般形成密集的社會網絡和信任。區內居民的在區內和區外的社交網絡顯得狹窄。居民多對家人和親戚信任，對朋友和鄰居的信任度顯得薄弱。
- 8.1.2 我們的研究再次證實社會資本和民間組織對提高深水埗區生活素質和社區關係滿意度的正面作用。擁有廣闊的團結式和橋接式社交網絡的居民，傾向對他們的生活素質有正面評估。提升生活素質也同時提升居民對區內社區關係



的滿意度。

8.1.3 我們的研究發現，團結式社會資本能為居民帶來情緒支援、慰藉和喜悅。同質的社交網絡有助建立互信。但是，深水埗區內的團結式社會資本薄弱。橋接式社會資本也有相同情況。深水埗的社區支援不比天水圍的強。居民的社交網絡大多仍是同質的。也就是說，橋接式社交網絡在區內很弱，令區內居民難以從不同階層社群得到資源協助。

8.1.4 雖然所有深水埗居民皆沒有充足的社會資本，但某些弱勢社群在這方面情況明顯比其他社群較差，值得我們關注。新移民的社交網絡最為狹窄。低收入家庭對朋友最不信任。唐樓居民的橋接式社會資本最為貧乏。

8.1.5 民間組織在結構和運作方面皆有隱患，減低了它們在區內促進社會資本的功能。深水埗民間團體與成員、支持者和受惠者的關係多是家長式的。因此，成員和受惠者傾向不願意和沒有能力在他們之間建立可持續的橫行關係網絡至特定活動完結之後。另外，組織之間也缺乏聯繫。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化的資源分配機制。組織間的疏離關係不利於建立橋接式社會資本，也不利帶動新興中產階層的資源投入到區內的弱勢社群。

## **8.2 強化社會資本的建議**

8.2.1 其中一個重要策略是重建和強化團結式社會資本。我們建議透過促進自助和互助活動和小組，如長者義工小組、單親家長小組、鄰睦互助計劃等，將居

民的情緒支援由家庭擴展到朋友和鄰居。民間組織必須得到充足的財政上和場所空間的支援來它們組織這類自助和互助活動。

8.2.2 面對面接觸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政府必須在深水埗區內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間如小公園和有蓋遊樂場來促進更多居民間的面對面接觸、聚會、閒談和其他日常交往。規劃城市時必須優先提供這類公共空間，而不是純粹提供一些居住和商業空間。

8.2.3 加強橋接式社會資本是另一個建議。經濟交易活動能自然地容易地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建立橋接式社會資本。政府和區議會可支持新舊社區的經濟計劃如二手店和環保產品消費者合作社，從而促進跨階層的交流 and 互動。

8.2.4 志願團體能促進區內居民間的交往，作為發展和維持社會資本的平台。但是，由於現時區內組織關係疏離，單單是輔助民間組織運作是不足以有效建立橋接式社會資本。因此，我們建議一項「社區發展」計劃，透過非政府組織的社工的工作彌補不同階層、種族和社群之間的結構性鴻溝。

8.2.5 在建立橋接式社會資本方面，我們提出設立「居民空間」這構想。「居民空間」的要點，並非是一個組織活動的「中心」或提供會議室和運動場地的「社區中心」。我們的「居民空間」的構想，是糅合了北河街街市和西九龍中心（濕貨市場、康體設施、免費空調場所、開放空間、小商店），這兩個都是深水埗居民所選取的深水埗地標。它的作用是為居民提供聚會地點、資

訊渠道和綜合不同特色的地方以吸引人流。區內的社區中心可循「居民空間」的構思重新發展，讓區內居民能自主地使用這空間。

### **8.3 區內社會分化加劇**

8.3.1 深水埗是存有差異和割裂的社區。無論在絕對數據和比較數據上，區內的社會資本和公民參與度均很低。但是，社經背景和住屋類型是影響社會資本和公民參與度的要素。擁有較高學歷和收入的居民，較多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

8.3.2 住屋類型方面，相對於處於另一極端的唐樓，「四小龍」儼如是一個被保護和充滿排他性的堡壘。它處於深水埗周邊，擁有清晰的界線劃分，形成有形的排他工具。它又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進一步減低它的對外聯繫。「四小龍」的貴族化外表則是一個社會性的排他工具，令它從鄰近社區割裂開來。另外，公共設施不足是「四小龍」居民和海麗村居民共同關注的地方。但是在這研究地區，跨階層和跨社群的聯繫十分罕見。

### **8.4 解決社會分化的建議**

8.4.1 建立一致和團結的社區形象有助於減輕深水埗區割裂的問題。資產導向和優勢導向的研究分析探討和理解深水埗居民的生活，能彌補傳統的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進而促進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同樣，促進居

民對地區特色和文化的鑑賞也是重要的。方法包括舉辦本土文化和文物遊、口述歷史計劃和成立地區博物館。

8.4.2 區內必須有切合深水埗居民需要的康樂設施。建議興建多些與北河街市政大樓五樓相類的室內遊憩設施，為弱勢社群，尤其是唐樓套房的居民，提供設有空調和舒適的消閒地方。

8.4.3 在深水埗中部必須興建更多公共設施包括公共圖書館、兒童遊樂場和公園。這些空間不但能滿足居民休憩需要，也能促進跨階層和社群的交往和聯繫。

8.4.4 民政事務處也可組織更多地域性的活動和盛事，促進在海麗村運作的非政府組織和「四小龍」的業主委員會的聯繫，進至建立橋接式社會資本。

## **8.5 土地使用的建議**

8.5.1 較低的住屋階層（公屋和唐樓居民）比較高的住屋階層（私人屋苑居民）較依賴深水埗中部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他們的物理流動性較低，與區外的聯繫也較薄弱。因此，他們較少在區外購買日常用品和消遣，也就特別較依賴深水埗中部滿足這兩方的需要。

8.5.2 基於深水埗中部對區內居民生活的重要性，城市更新計劃便得要小心規劃。大型的清拆重建計劃應盡量避免，因為它會對深水埗的地方空間以至弱勢社群的生活帶來不良影響。

8.5.3 城市「貴族化」和持續上升的土地價值會將貧窮人士驅逐出深水埗，使他們再不能享有城市中心交通便捷的優勢。大型的清拆重建計劃勢推高土地價

值，使現有的低廉物價不能維持。深水埗的城市生活將受到破壞。由於深水埗中部是維繫社區形象的核心，也是居民維持生計的地方，故我們建議深水埗中部的重建計劃以「更新」取代「清拆重建」為主要策略。

8.5.4 基於深水埗中部對區內所有居民的重要性，區內的交通配套必須加強。連接深水埗中部和周邊的地區，即海麗、富昌、石硤尾、白田、澤安各屋村的交通必須加強。另外，交通費必須保持在可負擔的水平。

